

# 发展话语的定位与差异

## ——基于北欧与中国的比较

吴 苗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发展的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决定了发展话语在世界发展话语体系中的定位。中国发展话语属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话语,北欧的发展话语则属于后现代化阶段的、发达西方国家的发展话语。两种发展话语又蕴含了对平等问题的实质关注。但是,从历史制度背景、发展中的主体认知和主体参与度、个体贫穷的解释逻辑等方面来看,两种发展话语又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性。这也决定了两种发展话语的独特性,以及在世界发展话语体系中的地位。两种发展话语的区别和互鉴性的研究,对于中国发展话语的科学总结和表达具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发展话语;定位;差异;北欧;中国

**中图分类号:** D2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7) 03-0245-07

发展话语<sup>①</sup>,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形态并与国家权力相关,是关于发展的话语表达和自我认识,也能反映出其在国际社会的认可度。北欧与中国的发展话语因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已成为多元发展话语体系中重要的二元。

北欧国家(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和冰岛)的合作,使其共同的发展理念在世界上引起广泛的影响,这是单个国家无法做到的。北欧理事会(the Nordic Council)属于五个主权国家议会及政府间的合作机构,宗旨是就北欧国家共同关心和需要采取联合行动的问题进行协商,促进经济合作与发展。北欧国家在发展合作的很多方面都具有 consistency,如:具有国际视野,胸怀全球;重视教育及研发,知识和创新成为国家实力提升的基础;坚持高税收、高福利

的社会保障制度。北欧发展话语,在实践中已被世界范围内公认为北欧模式,实践支撑的发展话语坚持人人平等的理念。中国发展话语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架内关于发展的概括,是对中国发展道路和特点的话语表达。这种发展话语的特点在于历史承继性和文化独特性,表达为通过现代化战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国家富强。两种发展话语有趋于一致的目标指向,但在发展经验的总结与表达上存在差异。

### 一、北欧与中国发展话语在世界发展话语体系中的定位

北欧与中国发展话语各代表了世界发展话语体系中的一元。从发展的纵向角度来看,北欧属于后

收稿日期:2016-12-06 网络出版日期:2017-04-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ZH185)

作者简介:吴 苗(1976—),女,陕西延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比较与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研究。

① 发展话语是用来解释发展的话语表达。Herath(2008)曾就全球化与依附论派对于发展的认识差异进行比较,Greenstein(2009)和Oprea(2012)提出了南非的可选择现代性和罗马尼亚的从社会主义到欧盟成员的发展话语,Fletcher(2014)则提出了国际发展话语的表达问题。中国学者张维为的《中国震撼》(2011)和《中国触动》(2012)两部著作提到了从全球视野中比较“中国经验”的问题,体现了中国发展的话语表达。后来,国内学者联系中国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中国的发展优势如何转化为话语优势(陈曙光,2014)、丰富中国话语体系(孔新峰,2016),以及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经验的问题(张康之,2017)。

现代化发展阶段,中国属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阶段,北欧的发展话语是后现代化的发展话语,而中国发展话语则属于现代化的发展话语;从发展的横向角度来看,北欧属于发达国家,位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属于西方话语阵营,处于世界话语体系影响的强势地位;中国则处于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在全球化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想努力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目标,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话语阵营,对于世界话语体系的影响则处于弱势地位。但是,二者又有发展话语目标上的一致性,中国的表达是共同富裕,北欧的表达更倾向于追求平等和幸福。

但是,从发展话语体系的主要框架来看,北欧与中国发展话语的比较脱离不开现代化、依附论及与世界体系理论相关联的世界历史视野。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世界体系理论作为一种有广泛影响的话语表达,在解释发展时,反对西化和西方中心论,体现了比“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发展话语更客观的一面。北欧与中国发展话语也是在这种话语背景下表达自己立场的。世界体系的视角同时修正了依附论坚持的世界各国所处中心——边缘位置难以根本改变的观点,认为世界体系具有流动性,尤其是中心与半边缘国家之间、半边缘与边缘国家之间的流动,使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复杂、可变的特点。

北欧福利发展话语的萌芽曾出现在早期资产阶级“福利国家”的改良主义主张里,如穆勒、德国历史学派和讲坛社会主义。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反面推动了学者们思考,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使国家干预和社会保障作为重要问题提出,福利经济思想逐步形成并被作为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途径。福利主张在实践上的重大突破,则始于“二战”后1945年的英国工党执政,欧洲福利国家论在资本主义世界赢得一席之地。从政策实践方面看,“二战”后的丹麦、瑞典、挪威等国较早地实现了现代化,福利国家建设起到了独特的示范作用,北欧发展话语的国际影响也在增大。在美国,经过凯恩斯主义者汉森、萨缪尔森、新制度主义者加尔布雷斯等人的宣传,福利国家论在美国也广泛流行。1958年加尔布雷斯的《富足社会》、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都是福利国家论的有力补充。1979,英国学者高夫的《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作了进一步研究。他认为,社会服务支出对于经济增长既能改善经济又可使经济低迷,降低利润率。从二战后英国的情况来看,他得出结论:正是高度的公

共支出使英国的通胀率和经济增长率恶化。<sup>[1]</sup>福利发展话语解释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化社会发展思路,但也提出自己的悖论。

客观上说,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属于世界体系中的边缘或半边缘国家,这一时期,中国尚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现代化也迟迟不能启动。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提出了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当时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现代化。在以苏为鉴的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逐步设想通过“四个现代化”的巩固基础,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切实地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1964年,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又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并将“四个现代化”的表述又调整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但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没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发展经济的目标又一度让位于“不断革命”,经济发展出现了较大挫折。封闭的环境和边缘位置使中国当时的发展话语在国际上的价值输出,基本处于劣势。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战略重新得到重视与展开。而此时的北欧已处于后现代化阶段,实践支撑下的北欧经验使福利国家理念更具合理性。

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广泛兴起,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所倡导的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对北欧发展话语有所冲击。西方主要发展话语的演变和各种代表性发展话语的出现,集中于发展主义的论述,从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社会进步理论到现代化理论,其哲学基础的单一性导致社会发展政策的单调性。新自由主义和之后出现的“第三条道路”理论<sup>①</sup>对北欧发展造成一定影响。Kildal和Kuhnle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北欧福利改革,普遍主义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普遍主义的福利政策条款经过了一些修正,经过经济调查确定补助的方式变得较为常用。<sup>[2]26-29</sup>20世纪90年代以后,冰岛更多地转向自由主义原则。<sup>[2]214</sup>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对于后现代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发展话语是

① 意指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吸收双方优点,“不左不右”的中间道路,有人将之理解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政界代表人物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理论界的代表人物为吉登斯。

一次根本调整。从英国、美国的发展实践来看,社会发展思路正在与福利发展话语渐行渐远。Esping-Anderson 将福利资本主义区分为三种模式: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自由主义模式,欧洲大陆的社会合作——保守主义模式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sup>[3]</sup>与西方的发展主义倾向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欧学者对自己的发展话语也进行了一定的论证。怀曼<sup>①</sup>所分析的“瑞典(雷恩-迈德纳)模式”为代表性著作。<sup>[4]</sup>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冲击了福利国家的发展话语和实践,但北欧本土学者否认所阐释的发展话语遇到根本挑战。Larsen 曾经就这种思想如何影响丹麦福利国家,进行过案例研究。他调查了丹麦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对之发挥独立影响的三个领域:失业保险、提前退休及税收。从案例来看,丹麦福利国家的发展模式也在经历从凯恩斯主义向货币主义的范式转换。然而,丹麦的范式转换并没有伴随着政治上转向右翼政府。新自由主义思想对于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民主党有所影响。但是,社会民主党执行了与其历史定位和选民认知相妥协的政策。<sup>[5]</sup>有学者认识到,降低福利主张的政策过程,根源于欧洲福利国家发展话语的式微,这些措施又进一步加强了话语本身的困境。但是,综合评价近年来福利政治发展,可以看到包括挪威在内的北欧国家,并没有向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社会保护趋同。<sup>[2] 28-29</sup>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北欧发展话语由于过度福利化和财政负担等不良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仍引起关注与反思。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发展及现代化战略的再次启动,均是由执政党来主导和推动的。党的领导人邓小平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与现代化相结合,把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的现代化表达,使中国的发展战略更要考虑国情特点,结合中国实际。执政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及政治报告围绕着现代化及发展问题提出目标,解决困难,凝聚共识。党的十二大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政治报告中,提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主性,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提到了现代化的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三大报告则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口

号。“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具体化为切实可行的步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形成框架。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党提出的现代化战略成为有效动员民众参与建设和发展的口号。也是在这一时期,凭借其经济领域的较大增速,中国的发展开始引起世界的注意。

至此,这两种典型的发展话语在世界话语体系中都占据了一定的位置,才有了比较的可能。北欧和中国的发展话语都是世界体系内主要发展话语的代表。二者理论渊源上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特征就是对于平等的价值追求。围绕着平等理念,在发展实践上则出现较大差异。从历史承继、文化差异等影响因素来看,二者对于发展的认识与表达也出现较大差异。但是,北欧与中国发展话语的差异及互鉴性,决定了二者都是对于世界发展话语体系的贡献者,对各自的发展话语建构或许都能提供启示。

## 二、历史制度背景的差异

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制度背景同样是研究者近年来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Wahl 认为福利国家的出现与两条关键发展线索关联,即劳工运动的兴起和政治民主的突破。也可以说,是资方和劳方之间达成的一种妥协,它是大多数人和劳工运动的社会进步的积累,资方的利益自然也会在这种妥协中得到体现。<sup>[6]</sup>发展中的各派政治力量最终在国家框架内达成一种妥协,对于社会发展和各派政治力量的存在来说,不失为一种好的历史选择。

Kildal 和 Kuhnle 则分析了对北欧普遍主义有益的制度背景因素,大致四个方面,它们单独或联合起来,有助于北欧普遍主义的社会和政治气候的形成。<sup>[2]25-26</sup>第一,是历史制度的先决条件。从16世纪以来的改革来看,当地社会有较长的对穷人的支持和责任的预改革历史、社会保障规划的一些早期的制度解决办法,对转换为普遍计划更为有益;第二,平等主义的前工业社会。北欧国家的早期农民都相

<sup>①</sup> 菲利普·怀曼认为,瑞典的发展是对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的转变。但他对瑞典的发展持有较为乐观的态度,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绩也有介绍,对瑞典所创造的这种发展模式也较为推崇。



对独立,农民有相对较强的政治功能,有益于确定普遍团结的福利方案;第三,由于种族、宗教和语言,还有对于福利议题的长期历史传统的公共责任,结合了相对平等主义的社会结构与相对同质化的小规模人口,使得普遍主义的社会规划更可能实现;第四,特别的危机。二战之后作为普遍主义的规划方案在北欧国家获得更有力和全面的介绍,有利于形成一个更广泛的共同价值平台。北欧发展话语的传播依赖于发展中对贫富分化问题的有效解决。北欧国家属于西方发达国家,同样的价值观以及所处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使其并未面临过在世界上的发展话语困境与争论等问题。而且,依赖成功的发展实践,北欧发展话语在世界上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中国发展话语则是在唯物史观视角的理论前提下表达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发展离不开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包括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等问题。中国的发展同样受到历史制度文化的背景制约,而这些因素绝大多数为现代社会发展的负面因素。第一,封建社会的历史和官僚等级制度的影响。封建社会历史漫长,封建专制主义和“官本位”对大众影响深厚,现代社会公民主体意识欠缺。第二,散漫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独立、散漫、自给自足,但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不能实现普遍的农业规模化经营,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农民经济地位低下,政治功能较弱。第三,中国地域广大,发展不平衡,多样化民族宗教的存在导致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大规模的异质化人口,更易形成碎片化的社会。第四,战争危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政治衰败,国家分裂,缺乏坚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力量。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党政权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由于1937年日本侵华,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断。中国的发展通常是通过激烈的反传统步骤展示出来,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目标,需要政治动员来唤起普通民众。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中国后,才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提出,是基于近代百年来中国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不利局面提出的,这个话语表达也成为对普通民众最直观的政治动员口号。从对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认识,到反思其不足,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更为成熟和全面。

### 三、发展中的主体认知和主体参与度差异

北欧的特征——普遍的高水平福利,高度的平等,整合社会公民的明确努力和对所有人保证就

业——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竞相模仿的标准,公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实践得到关注。在北欧国家,令人印象深刻的民主架构的稳定性,联系着其公民对福利国家政策的高支持率,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其他国家对北欧模式的兴趣。北欧国家相对达到国际标准的富裕,也使得这一兴趣几乎不会减少。北欧国家更像是表明在竞争性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框架内,个人生命机会的增强与国家干预和配给多项福利领域是可以很好地统一的。<sup>[7]</sup>因其对国家与市场的“最好平衡”,个人与政府之间的积极互动,北欧福利国家被认为是福利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

北欧的发展适合小国少民的基本国情,但也会出现进步与困境并存的局面,发展理念也在经历一些调整。Kvist 和 Greve 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北欧福利模式经历了一场根本转型。观察丹麦,可以看到一种全民福利国家模式正在转型成为新兴的多层次福利国家模式,个人、集体是公共计划的补充。2000年以来,关注家庭、失业人员和疾病人员的多层次福利仍在发展。尽管丹麦仍然提供了核心福利国家的全民福利,但更为双元和突出个人,参与劳动力市场也是获得利益的更重要方式,对于福利国家的新建构和理解,突出两者的联系,或者是更为注重提升个人因素的措施。<sup>[8]</sup>北欧引以为自豪的福利模式得以进一步发展,福利模式所依据的市政系统也在民主的原则上不断改革与完善。从市政规模和民主的关联看,北欧福利国家建立在独特的高度分权的市政系统之上。Larsen 对于丹麦出现的市政合并进行考察,认为尽管更小规模的地方自治中,参与度更高。然而,市政规模不影响公民在当地政治中的认知和利益,它也不影响公民对当地政客的认识和他们对当地政治决策的信任。<sup>[9]</sup>所以,民主运行与市政系统运作都处在良性过程,公众由于整体文化素质较高,政治主体认知和意识较强,使得发展实践较为成功,发展话语对外界的影响力较强。

中国的发展统一于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关系中。社会主义制度很先进,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很低,在当代中国这一对矛盾是共存的。中国普通家庭的经济实力与个人受教育程度决定了公民的主体意识普遍较弱,且差异较大,普通公众的主体意识仍待提高。中国的发展战略,从出台到执行,也是由执政党主导的从上层向下层的推动过程,政治动员在公众接受、认知和参与这一战略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素质参差,现阶段阶层矛盾比较突出。

市场化改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发展成就还是被世界所认可,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潜力也得到国外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

中国的发展也成为与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不同的、特殊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种发展,通常是极具难度的,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基本格局确定的条件下。要在这样一个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水平极端落后的国家,实现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提升,实属不易。所以,中国发展话语的自我认同和世界认同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世纪以来,执政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体现出对发展的全方位关注,可持续的发展被重点提出,这也可以被看作是对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补充。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发展话语的表达为“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通过深化改革、依法治国,政治领导层从严治党,来实现小康社会和中国梦。主要体现为对发展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和矛盾,从政策上予以关注,从全局上进行把握,以推动改革和发展。目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观点,体现了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经济成就在世界上引起广泛影响,在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亟待解决,需要总结发展经验,实现话语提升。同时,中国基尼系数最近几年超过世界“警戒线”,反映了发展中出现了较严重的、可能影响发展的贫富差距问题,这对于中国发展话语的自我认同和世界认同都是不利因素。

#### 四、个体贫穷的解释逻辑差异

从对于社会中出现贫穷的解释路径来看,两种发展话语也存在差异性。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最有可能出现贫穷现象。对贫穷的不同解释,影响了公众对于个人在社会发展中功能评价的基本价值判断,发展实践和发展话语因而具有差异。Blomberg和Kroll认为,在北欧国家,对于贫穷现象主要有三种传统解释:一是结构性解释,主要集中于外在的社会和经济因素;二是个人化的解释,强调穷人个人的特征和行为所致的原因;三是命运的解释,将贫穷归因于坏的运气和命运。<sup>[10]</sup> Van Oorschott和Halman曾区别了四种解释,一是归于个人的问题,二是归于

个人的命运,三是归于社会问题,四是归于社会的命运。<sup>[11]</sup>从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角度来看,认为个人和社会首先存在问题,体现了对个人和社会的批评和责备态度。个人由于懒惰和较差的品格特点而贫穷。而社会也应该对贫穷负有责任,统治精英和社会造成了贫穷现象,穷人是牺牲品,贫穷的原因在于更强的社会群体对穷人的歧视。与此相反,从命运角度的分析来看,没有主体被认为应该为贫穷负责。相反,贫穷被认为是由于不幸和坏运气相伴而出现的一种结果,或作为“自然”的社会过程的结果。例如,与市场经济关联的经济状况的好坏都可能产生这种结果。根据Blomberg和Kroll所做的数据分析,在北欧国家对贫穷最基本、最为通常的解释是归于社会问题。所以,解决贫穷问题主要通过分配领域的税收调节和对弱势群体的福利政策来完成。

在中国,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贫穷的解释话语显示出不同的特点。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对于出现农民和城市贫民的贫穷现象,被认为是旧社会遗留下的问题,政府会通过扶助和互助模式帮助解决。为了避免出现新的两极分化现象,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中国共产党推动了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于1956年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是,这种比较高的生产关系并不适应中国落后的生产力状况。一直到1978年的这段时间,平均主义成为了社会主义的代名词,至少在社会大众中的意识是这样的。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提出和经济特区的建立,中共领导层调整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认为平均主义限制了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阻碍了发展。1984年2月,领导人邓小平则明确指出:“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sup>[12]</sup>之后,中国分配政策的导向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更为注重效率。对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出现的贫穷现象,公众也较多从个人先天禀赋较差和后天努力不够去解释。本世纪初,贫富分化的社会现象开始显现,中国开始关注对于社会公平的保障政策。党的十六大以来,已对社会公平原则更多关注,形成了完善社会保障的更多政策解释。

北欧的发展通过社会福利体制的调节,有效地解决了贫富差距的问题,公众幸福指数较其他国家更高。“在盎格鲁——撒克逊(指英美)国家中,国家通过税收直接进行社会福利支付,享受支付的依据是通过纳税或因为各种贫困而获得的‘资格’,对于社团主义传统的欧洲大陆国家来说,缴费群体成为

一个享有权利的俱乐部,外来人很难‘融入’,只有在北欧国家,社会权利才具有社会意义。”<sup>[13]</sup>今天,贫富差距已成为阻碍发展的世界性难题,北欧由于其较高的社会信任程度<sup>[14]</sup>,发展话语基本上在世界上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形象。尽管有代表性的北欧四国丹麦、瑞典、挪威和芬兰国家面积较小,但国家发展以创新和科技实力为支撑,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毫无疑义地处于发达国家行列。运用唯物史观看待北欧发展话语,可以发现它是世界多元发展话语中的关键一元,理论上出现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发展话语的实践结果也是可以令人信服的,是可以借鉴学习的话语表达和实践过程,具有对世界发展话语多元化构建的当代价值及对中国发展的借鉴作用。

## 五、结 语

北欧国家的合作,基于北欧各国的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特色,通过北欧理事会协调各自发展与合作,使各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中协调统一,对外的发展话语能得到具有最大共识基础的表达。北欧发展话语所凭借的成功的发展实践,使得世界对此的认可度不断增强。但是,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对于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产品、服务、资本及人员需要自由流动,以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因此,“必须发展新的社会保护机制,用以适应新的市场需要”。“依照这一认识进行的社会建设不是福利国家的一体化,这是一个由多个福利国家‘粘和’而成的社会欧洲,而不是一个使福利国家融合为一体的福利欧洲。”“在欧洲联盟的层面上出现了国家间在社会功能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同时还产生了超国家的政策指导和监督机制。”<sup>[15]</sup>目前,丹麦、瑞典和芬兰是欧盟成员国,所以,欧盟可能对以后的北欧发展还会有较大影响。

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科学系北欧亚洲研究院(the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主要从社会科学视角对现代亚洲及与北欧发展进行比较研究,是双方发展交流的一个平台,以突显北欧价值。这个研究中心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对于北欧价值的话语表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12年,学者Nielsen和Helgesen合作编辑了《理念、社会和政治——东北亚和北欧比较研究》<sup>[16]</sup>一书,收集了对北欧和东北亚发展进行比较研究的多篇论文,内容涉及传统,压力下的民主和福利表达,东西方的对话、合作和一致等问题,并提出了推进北欧和东北亚

研究网的目标。另外,丹麦奥尔堡大学比较福利研究中心,是北欧发展研究的另外一个中心,是政治科学系的一个多学科比较发展研究中心,也开展了北欧与中国发展的比较研究。对于中国问题的关注,与北欧相关的发展问题相比较,出现了新的研究成果,如Kongshøj所作的北欧与中国的社会公民权利的比较<sup>[17]</sup>。

而中国对于北欧福利国家的研究,及与本国发展的比较研究在世界上的表达和推动,力量明显薄弱。为什么会形成北欧发展话语,它的实践效果的实证研究,及它对当前的中国发展话语研究有怎样的作用,还应该进一步考察。从发展话语的演变和比较中,可以更好地认识资本主义、改良资本主义、北欧与中国发展话语的关系。北欧国家的发展话语仅仅用改良资本主义的视角来解释,未免太单一和绝对。北欧的发展,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更为重要。艾斯平·安德森研究福利体制的方法论包括二维视角:中轴原理视角和比较历史视角。中轴原理视角倡导直接把握社会福利制度的本质属性来建构福利体制的类型学;比较历史视角强调从国家的历史结构中寻找类型学差异的原因。<sup>[18]</sup>关于北欧福利发展的研究,中国学者的研究视角也逐渐多样和综合,对其话语分析也更为客观。此外,对于中国发展话语的理解中,国外学者的分析也有不尽合理之处,如Bell对于中国儒学在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理解。<sup>[19]</sup>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对于平等理念的贯彻仍须学习和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进行话语表达。平等理念在北欧福利国家中的嬗变,包括其历程、原因和实践等问题的研究,能给我们提供启示。如何看待西方国家的发展与如何正确认识本国自己的发展,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当前所谓的北欧发展话语实质上是世界“发展”话语的一种典型代表,有长处和积极意义,但是,将之等同于科学的发展存在不妥。北欧发展话语在实践中也是具体的,难以超出本国特色的范畴,在理论上还有进一步科学化的空间;中国发展话语以唯物史观的发展研究为哲学基础,也具有本国特色,随着实践的发展也不断在作出调整。两种发展话语的比较对于看清国家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具有积极作用。运用建构主义的视角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论证世界多元话语建构的必然性和科学性;能够进一步科学认识北欧发展话语与中国发展话语各自的独特性和互鉴性。对比北欧与中国发展话语的区别,研究二者的互鉴性,或许从理论价值来说,更有启发意义。



## 参考文献:

- [1] GOUGH 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 [M]. London: Macmillan, 1979:126-128.
- [2] KILDAL N, KUHNLE S. The Nordic welfare model and the idea of universalism [M]//KILDAL N, KUHNLE S.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The Nordic Exper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13-33.
- [3] ESPING-ANDERSEN G.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9.
- [4] 菲利普·怀曼. 瑞典与“第三条道路”:一种宏观经济学的评价[M]. 刘庸安, 彭萍萍, 郭伟伟, 等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41.
- [5] LARSEN C A, ANDERSEN J G. How new economic ideas changed the Danish welfare state; The case of Neoliberal ideas and highly organized social democratic interests [J]. Governance, 2009, 22(2): 239-261.
- [6] WAHL 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elfare State [M]. London: Pluto Press, 2011: 20-21.
- [7] GREVE B. Are the Nordic welfare states still distinct? [J].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2004(38): 115-118.
- [8] KVIST J, GREVE B. Has the Nordic welfare model been transformed? [J].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2011 (45): 146-160.
- [9] LARSEN C A. Municipal size and democrac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argument of proximity based on the case of Denmark [J].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2002 (25): 317-332.
- [10] BLOMBERG H, KROLL C, KALLIO J, et al. Social workers' perceptions of the causes of poverty in the Nordic countries[J].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13(23): 68-82.
- [11] VAN OORSCHOT W, HALMAN L. Blame or fate, individual or social?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popular explanations of poverty [J]. European Societies, 2000, 2(1): 1-28.
- [1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52.
- [13] 周弘. 西方福利国家的“政策产生政治”现象[J]. 中国社会保障, 2015(10): 26.
- [14] LARSEN C A.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 Cohesi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Social Trust in the US, UK, Sweden and Denmark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99-200.
- [15] 周弘. 福利国家向何处去[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3): 93-112.
- [16] NIELSEN R T, HELGESEN G. Idea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ortheast Asia and Northern Europe: Worlds Apart,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M].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12.
- [17] KONGSHØJ K. Soc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and the Nordic Countries [M]. Aalborg: Aalborg University Press, 2015.
- [18] 李棉管. 福利体制研究中的二维视角: 评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方法论[J]. 社会建设, 2015, 2(5): 88-96.
- [19] BELL D A. From Marx to Confucius: Changing Discourses on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J]. Dissent, 2007, 54(2): 20-28.

## The Position and Differences of Development Discourses: Based on Comparison Between Scandinavia and China

WU Miao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longitudinal dimension and horizontal dimension of development determine the position of development discourse in the development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world. China's development discourse belongs to the development discours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he Nordic development discourse belongs to the development discourse of developed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post-modernization stage. The two development discourses also contain substantive concerns about equality. However, from the point of views such as 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the subject cogn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subject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the logic interpretation of individual povert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development discourses cannot be ignored. This also determines the uniqueness of the two development discourses and their position in the world. The discrepancy of the two development discourses and the study on their mutuality can play an arousing role on the scientific summary and expression of Chinese development discourse.

**Key words:** development discourse; position; difference; Scandinavia; China

(责任编辑: 王艳娟)